

# 《玉臺新詠》趙氏覆宋本 系統諸版本略說

傅 剛\*

## 提 要

本文主要討論明末趙均覆宋陳玉父本《玉臺新詠》之後，清代出現的幾種趙本系統的校、注、考異本，主要有：趙均覆宋本、二馮（馮舒、馮班）校本、吳兆宜注、程琰刪本、《四庫全書》本、徐乃昌刻本。經過研究，這幾種版本均存在問題，主要是：

- 一、現存傳世的趙氏覆宋本有初刻初印和修板重印及補板後印的區別，根據我們大致的調查，起碼有可分為三種類型印本。初刻本與補修本的文字有不同。故此我們使用趙氏覆宋本時，必須要慎重，並有所交待。
- 二、二馮校本校語中所提的宋本，往往與趙氏本合，而非其所抄的宋陳玉父本。
- 三、《四庫全書》本，其底本亦為趙氏覆宋本，而非紀昀所說宋陳玉父本。又，現今傳世的文淵閣和文津閣本，二本歧異甚多，使用時必須有區別。
- 四、吳兆宜注本有初注和後注區別。初注本的底本用明通行本，後注本則據趙

---

本文於 103.06.10 收稿，103.09.24 審查通過。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DOI:10.6281/NTUCL.2014.09.46.04

氏本，故今所見之後注本中往往留有明本的特徵。又，吳本未曾刊刻，後程琰刪補合吳本一起刊刻，但程氏對吳本作了刪節，故吳本原有體例已不甚明。

五、徐乃昌影刻趙本，底本系趙均覆宋本的第二次印本，即初刻修字印本，與現在所見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徐乃昌舊藏本不同。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徐乃昌舊藏本系趙均覆宋本的第三次印本，即補板後印本。學術界往往誤以為此本即徐乃昌刻本的底本，至於徐乃昌刻本出現與此本不同的地方，學術界誤判為徐乃昌校刻所致。其實徐乃昌刻本所據底本並非他的這個藏本，而是全據趙均覆宋本的第二次印本影刻，徐氏對底本沒有作校改。

**關鍵詞：**《玉臺新詠》、趙均、二馮、吳兆宜、徐乃昌

# The Editions in Zhao Jun's Editing System of the *New Songs* *from the Jade Terrace*

Fu Gang\*

## Abstract

The article studies the editions in Zhao Jun's editing system of the *New Songs from the Jade Terrace*. The system starts with the edition that Ming Dynasty Zhao Jun reprints from Song Dynasty Chen Yu-Fu's edition. Many editions of this system are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Zhao Jun's reprint edition, Feng brothers' proofread edition, Wu Zhao-Yi's annotated edition, Cheng Yan's abridged edition,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edition, and Xu Nai-Chang's woodblock print edition. All these editions have problems, as listed below:

1. There are three versions of Zhao Jun's reprint edition: the first version; the second version, printed after repair of the first version's printing plate; and the third edition, reprinted after supplement to the second version's printing plat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and mention which version is used when using them.
2. The "Song edition" mentioned in the proofread edition of the Feng Brothers—Feng Shu and Feng Ban—does not refer to the edition they copy from: the Song Dynasty Chen Yu-Fu's edition, but Zhao Jun's reprint edition.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3.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edition is also Zhao Jun's edition, not Chen Yu-Fu's edition as Ji Yun says.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en-Yuan Chamber edition and the Wen-Jin Chamber edition, so which one of the two editions is being used should be specified.
4. Wu Zhao-Yi's annotated edition includes two versions. The book that Wu annotates later is Zhao Jun's reprint edition while the one that Wu first annotates is the edition most common in the Ming Dynasty, so the later one has some of Ming common edition's features. Wu's annotated edition has never been printed. Cheng Yan abridges it before compiling it into his abridged edition, so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can never be seen now.
5. Xu Nai-Chang's woodblock print edition is based on the second version of Zhao's edition, while the book that Xu has collected and the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cts now is the third version of Zhao's edition. However, it is often mistakenly thought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that Zhao's second version is the basis of Xu's woodblock print edition, and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Zhao's second version and Xu's woodblock print edition are Xu's mistakes when he reprints the book. Xu does not modify the content of Zhao's second version when making the woodblock print edition from it.

***Keywords:* New Songs from the Jade Terrace, Zhao Jun, the Feng brothers,  
Wu Zhao-Yi, Xu Nai-Chang**

# 《玉臺新詠》趙氏覆宋本 系統諸版本略說

傅 剛

學術界對《玉臺新詠》版本的關注，較多地放在趙氏覆宋本與明代通行本如鄭玄撫、徐學謨本的歧異上，而其實趙氏覆宋本自身卻也問題多多。我們瞭解比較多的趙氏覆宋本系統的《玉臺新詠》版本，主要有以下諸種：

- 一、趙均覆宋本
- 二、二馮校刻本
- 三、《四庫全書》本
- 四、吳兆宜注本
- 五、徐乃昌影刻本

以上這幾種版本同屬於宋陳玉父本系統，底本都相同，本不應該存在問題，但實際上這幾種版本，均都存有各種各樣的問題。趙氏覆宋本所覆底本是陳玉父本，但趙均覆刻時對陳玉父本作了整理和對證，已非陳本原貌。二馮校本據馮鼂的跋，稱二馮「一以宋刻本為正」，所據似是宋陳玉父本，但以之與二馮抄宋陳玉父本相校，多有不合，故其校記所稱「宋本」，並非全是陳本。吳兆宜校注本，據徐鉉的跋及其書體例看，應是趙氏覆宋本，但此本之字句往往非出自趙本，而合於明本。徐乃昌翻刻趙本，本來沒有問題，但因為趙氏覆宋本起碼有三次印本，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徐乃昌舊藏趙氏本，此影印本為趙氏覆宋本的第三次印本，與徐乃昌刻本字句上有較大歧異，學術界遂

以為徐乃昌翻刻時曾經校正修改過，事實並非如此，徐乃昌翻刻趙本，底本是趙氏覆宋本的第二次印本，與其舊藏的第三次印本不同。概言之，徐乃昌並未對趙本校正修改。

通過對以上幾種版本的研究，我們發現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或注意不夠的現象，主要是：

- 一、現存傳世的趙氏覆宋本有初刻初印和修板重印及補板後印的區別，根據我們大致的調查，起碼有可分為三種類型印本。初刻本與補修本的文字有不同。故此我們使用趙氏覆宋本時，必須要慎重，並有所交待。
- 二、二馮校本校語中所提的宋本，往往與趙氏本合，而非其所抄的宋陳玉父本。
- 三、《四庫全書》本，其底本亦為趙氏覆宋本，而非紀昀所說宋陳玉父本。又，現今傳世的文淵閣和文津閣本，二本歧異甚多，使用時必須有區別。
- 四、吳兆宜注本有初注和後注區別。初注本的底本用明通行本，後注本則據趙氏本，故今所見之後注本中往往留有明本的特徵。又，吳本未曾刊刻，後程琰刪補合吳本一起刊刻，但程氏對吳本作了刪節，故吳本原有體例已不甚明。
- 五、徐乃昌影刻趙本，全據第二次印本，未作校改。

以下就各版本略加討論。

## 一、趙氏覆宋本<sup>1</sup>

趙均覆本，自刊刻後，在當時即已稱罕見。徐鈺為吳兆宜注本所作序說：「聞滄桑以後，斯板已經毀廢，當時所印，止百十餘本。」可見趙氏印數極少。今所傳趙氏覆宋本，多存於公立圖書館。據劉躍進教授統計，約有三十多種。但今存之趙氏本，據劉躍進說，其實有初印及後印之別。<sup>2</sup>又據林夕先生說，

<sup>1</sup> 關於趙氏覆宋本，本人已撰有專文討論，詳參拙作：〈《玉臺新詠》趙氏覆宋本的刊印〉，載《文獻》2013年第4期，頁38-54。

<sup>2</sup> 參劉躍進：《玉臺新詠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7月），頁22-27。

今存之趙氏本其實分三種情形：

- 一、原刻未修印本：此本於魏書所列各鑒別字都與徐本相同，與魏書所說趙本不同。此本卷二目錄「石崇王昭君辭一首」下無小字「並序」二字；卷六目錄「孔翁歸奉湘東王班姬一首」，作「奉」，不作「和」：這些與徐本不同。所見此本為涵芬樓舊藏，見《涵芬樓燼餘書錄》集部九十九頁第三部，四冊。今藏北京圖書館。此印本罕見。
- 二、原刻修板印本：此本與上本同，唯上述卷二和卷六目錄兩處，此本有「並序」二小字，而且作「和」不作「奉」。此印本多見。
- 三、原刻補板印本：此本於魏書所列各鑒別字都與魏書所說趙本同，卻與徐本不同。此本卷四第一葉邊框窄，與其他各葉不類，顯係補板，故錯字迭見。除魏書所說外，至少還有七處顯誤。卷十第六十七和第六十八兩葉都是補板。卷尾陳玉父後敘雖非補板，但下邊框上方數字有補刻痕跡，如「唐花間集」之「唐」字第一筆，原板作短橫，補刻作點。看來「鮮」和「花」誤為「以」和「苗」係補刻所致，第一第二兩種印本都不誤。一九五五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即為此本。此印本多見。<sup>3</sup>

案，林氏所說第一種國家圖書館所藏初刻初印本，當即再造善本影印本。據其書藏印，早期的藏家有季振宜，後歸涵芬樓。<sup>4</sup> 第二種多見，如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葉萬批校過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原涵芬樓舊藏本、周叔弼舊藏本等、錢謙益跋本、袁克文跋本等（以下概以「葉萬本等」名之）皆是。該本卷二目錄「石崇王昭君辭一首」下有「並序」二字，又卷六目錄孔翁歸詩作「和」不作「奉」。第三種指文學古籍刊行社據徐乃昌藏本影印本（以下稱「徐乃昌藏本」）。文中所說「魏書」，指魏隱儒等編著《版本鑒定叢談》所論趙本、徐本之間的差異。魏隱儒以趙本與徐本比對，指出二本大致有三處區別：

<sup>3</sup> 林文見《讀書》1997年第7期，頁145-148。

<sup>4</sup> 藏印有「子京之印」朱方、「墨林」陰文長方印，然項子京是明嘉靖、萬曆年間藏家，當不及見趙氏本，故疑此藏印當為作偽者割充宋本時所鈐。

一、卷四第二十一葉首行趙本為「遠晚申千里外……行路正威遠」，徐本則作「遠脫巾千里外……行路正威遲」。

二、卷十第六十八葉末行上端，趙本為「黃葛」，<sup>5</sup>徐本為「黃鳥」。<sup>6</sup>

三、後序第七十四葉第八行末字，趙本為「以矣」（是錯的）；徐本為「鮮矣」（是對的）。第九行末趙本為「苗間集」（誤）；徐本為「花間集」（正）。

案，魏氏是最早對趙氏本和徐乃昌刻本發現問題的學者，不過，他沒有意識到徐乃昌刻本與徐氏藏本並非同一底本，所以他指出徐乃昌刻本與徐乃昌藏本有諸多不同，但沒有指出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

除了以上各家所述這幾處特徵外，其實還有多處異文，亦可以作為鑒定的參考：

一、徐陵《玉臺新詠序》「其人五陵豪族」句「族」字，國家圖書館藏本作「俗」，<sup>7</sup>「俗」與「族」在吳語中音近，或是刻手誤讀誤刻。此誤字似僅見於初刻初印本中，葉萬藏本等均不誤。從此字在諸本中的表現看，作「族」字諸本，其「族」字字形小，與上下字不類，且墨色加重，不像「俗」字與上下字切合無間，是趙氏本剛剛刻成便作過修版。

二、卷十江洪詩「北牖風催樹」首下，葉萬藏本等有「已上六首和巴陵王四詠」小字十字，國家圖書館藏本無，但徐乃昌藏本有。

三、卷五沈約詩題「擬三婦」，國家圖書館藏本「婦」下有「豔」字，葉萬藏本等皆無。

四、卷七蕭紀詩「和湘東王」題，國家圖書館藏本作「和湘東王應令夜寢」，葉萬藏本等作「和湘東王夜寢應令」。「夜寢應令」四字明顯為修版，與「和湘東王」字體不符。

綜合以上各家所述，傳世趙本大概具有這樣幾種不同特徵的刻本：

<sup>5</sup> 剛案，此字字庫無，其最末四點實作兩點。

<sup>6</sup> 剛案，此字末四點亦為兩點。

<sup>7</sup> 作「俗」字本者，除國家圖書館藏本外，尚曾見有嘉德 1998 和 1999 年拍賣鈐有「天祿繼鑒」印本兩種。

- 一、初刻初印本。此本卷二目錄石崇詩下無「並序」二字、卷六目錄孔翁歸詩作「奉」字、卷六目錄吳均詩作二十首、卷四〈秋胡詩〉作「違脫巾千里外」和「威遲」、卷十〈近代吳歌〉作「黃蔦」、<sup>8</sup>卷首〈序〉「族」誤作「俗」、卷末陳玉父《後序》「鮮」、「花」均不誤、「唐」字未作修改；此本有國家圖書館藏本、中科院現藏原東方文化學院舊藏本為證。
- 二、初刻修字重印本。此本卷二目錄石崇詩下有「並序」二字、卷六目錄孔翁歸詩作「和」字、卷六目錄吳均詩作三十四首、卷四〈秋胡詩〉作「違脫巾」和「威遲」、卷十〈近代吳歌〉作「黃鳥」、<sup>9</sup>卷首《序》「俗」修作「族」字、卷末陳玉父〈後序〉「鮮」、「花」不誤、「唐」字未作修改；此本有葉萬藏本等為證。
- 三、補板後印本。此本卷二目錄石崇詩下有「並序」二字，卷六目錄孔翁歸詩作「和」字，卷四〈秋胡詩〉作「遠晚申」和「威退」、卷十〈近代吳歌〉作「黃蔦」、<sup>10</sup>卷首〈序〉「俗」修作「族」字、卷末陳玉父〈後序〉「鮮」誤作「以」、「花」誤作「苗」、「唐」字上頭短橫修作一點；此本有徐乃昌藏本為證。

林夕先生稱徐乃昌刻本並非據其藏本，此言甚有理，今據上述各本特徵，徐乃昌刻本與葉萬藏本等相合，如「鳥」字無草頭，是見徐乃昌刻書所據本應是和葉萬藏本等同為一版的修版印本。

從上述各本看，國家圖書館藏本當為初刻初印者，其後有葉萬藏本、錢跋本、袁跋本等，亦屬初刻本，但此本據別本改正了初刻本誤字，同時也改動了卷二、卷六目錄中的字。再其後，因版片磨損而加修版後印，徐乃昌藏本即是。此本沿襲了葉萬藏本卷二、卷六目錄的特徵，但卷四〈秋胡詩〉中兩句因原字受損而誤修為「遠晚申」和「退」字，又陳玉父〈後序〉中的「鮮」字亦已磨

<sup>8</sup> 「蔦」字末四點作一橫勾。

<sup>9</sup> 「鳥」字末四點作一橫勾。

<sup>10</sup> 「蔦」字末四點作兩點。

減，刻工遂修成「以」字。魏隱儒先生所見本，因未目驗，故難以判斷。

根據以上四種不同特徵的趙本形態看，似乎是趙本在初刻後不久就發現有誤字，如「俗」字，於是加以修版，將「俗」改為「族」。同時修版人對卷二、卷六目錄中石崇的詩和孔翁歸的詩作了改動。

關於趙氏本的來歷和覆刻，也存有一些問題。據前人有關記載，南宋陳玉父的這個刻本，到底是趙均所得，還是他的父親趙宦光所得，似乎有不同說法。學術界一般都說是趙均於明末購藏陳玉父刻本，故士林為之驚喜。但《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此本說得自趙宦光家，暗示此本為趙宦光收得。清末常熟翁同書跋馮班鈔宋本說：「明寒山趙宦光嘗得嘉定乙亥永嘉陳玉父本影寫授梓，足以亂真。今之書賈以宋刻欺人者，皆是物也。二馮先生曾就靈均手鈔。」這話似乎混淆趙宦光和趙均為一人。第一句就不對，即使是趙宦光購藏了陳玉父刻本，但覆刻者卻是他的兒子趙均，翁同書顯然將二人混同了。趙均在覆刻本跋中對這個版本的優點做了實事求是的評價，又稱「今合同志中詳加對證」，顯然是他主持刻事。但這個跋也沒有交待此本的來歷，到底何人、何時收藏，亦無可確知。

趙均的覆刻本非如翁同書所說是影寫，而是做了許多校證。他在覆本的跋中明確說：「故今又合同志中詳加對證，雖隨珠多類，虹玉仍瑕，然東宮之令旨還傳，學士之崇尊斯在。」這是說趙均此本已經改變宋本原貌。這樣的意思，馮班說得更加清楚。他在跋其校本《玉臺新詠》中說：「宋刻參差不一，趙氏已整齊一番矣。」趙均覆本到底在哪些地方做過改動，我曾在〈《玉臺新詠》版本補錄·馮班抄宋本〉中作過介紹，主要是版式上由原來的參差不齊改為整齊，此外在字句上亦多有改動，也就是趙均所說的「詳加對證」。<sup>11</sup>

字句的改動，據與馮鈔本相校，數量至夥。因趙均所藏宋陳玉父本下落不明，故後世僅能據趙氏覆本以見宋本原貌。但趙氏本既有改動，則難稱宋本。以馮鈔本校趙氏覆本，略可見出趙氏覆本改動前的面貌。趙氏覆本改動的原

<sup>11</sup> 拙作：〈《玉臺新詠》版本補錄〉，《文史》2004年第3期，頁149-169。

因，自然是針對陳玉父本的錯謬，其所改動，應該是經過考訂的。比如卷五江淹〈雜體詩〉「休上人怨別」首「悵望雲陽臺」句「雲陽」二字，馮鈔本作「陽雲」。此二字五雲溪館本、徐學謨本、鄭玄撫本等明本均作「陽雲」，但趙均覆本卻改作「雲陽」。《玉臺新詠考異》說：「案，《史記·司馬相如傳》：『楚王乃登雲陽之台。』孟康注曰：『雲夢中高唐之台，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則『陽雲』為誤。」據此，是趙均參據《史記·司馬相如傳》所作的改動。又如鮑子卿〈詠玉階〉「微澗拂羅衣」句「澗」字，馮鈔本作「殿」。案，此字明通行本均作「澗」，《玉臺新詠考異》說：「案，階非流水，不得有澗灑之紋。《爾雅》：『澗，謂之泥。』《說文》：『滓，澗也。』此正指人行之處泥滓微跡，作『澗』為是。」趙均覆本不從通行本作「澗」，而改作「殿」，當亦如紀昀考訂據《爾雅》所改。

有一些是底本明顯錯誤而改動者，如卷七蕭綱〈戲作豔詩〉「含辭未及吐」句「及吐」二字，馮鈔本作「吐及」，則是誤倒。又如卷五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安陵泣前魚」句「安陵」二字，陳玉父本誤倒為「陵安」，趙均覆宋本則改作「安陵」。

## 二、二馮校本

此本實為二馮校定、馮鼇刻，刻年當清康熙年間。書前有陳鵬年序，其稱歲在甲午，即康熙五十三年。又書末有馮鼇跋，述其刻書緣由，署年亦標康熙五十三年。二馮即虞山馮舒、馮班兄弟。此本前載有馮舒跋，稱其在得知寒山趙氏有宋陳玉父本後，遂偕其弟及諸友赴趙氏所，費六日之功抄畢，此即現藏於北京圖書館的馮抄本《玉臺新詠》。據馮舒所述，是二馮校本在獲觀宋陳玉父本之後所校刻，故其本當依陳玉父本。但陳玉父本錯謬實多，且行格不一，趙均覆刻時遂作整齊校改，故二馮校本亦多所校改。二馮所校，底本依陳玉父本，又旁參諸本，故《四庫全書存目提要》說此本：「較諸本為善。」二馮校《玉臺新詠》在得趙氏所藏宋陳玉父本之後，但刊刻則由其後人馮鼇所完成。據馮

鼇《跋》稱，二馮校書數十種，除《才調集》付新安汪氏所刻外，其餘大約皆未刊行。其校《玉臺新詠》底本亦落入錢遵王之家，後馮鼇從友人處得之，始謀付梓行。馮鼇刻本其實並非二馮舊貌，據馮鼇說，他後又得毛晉汲古閣所藏本，字句一遵宋刻，復有黃筆點定，閱後跋知為馮班手筆。馮鼇又覓得趙氏、楊氏本查核校對。由是知此馮鼇刻本，又已經馮鼇校改一過。所用本底本為陳玉父本，旁稽之本則有馮鼇所稱之趙本、毛晉汲古閣藏本、楊玄鑰本等。

二馮校本未明標體例，當與其本是批校非刊刻著書有關。據其校語，大略知此本底本雖依陳玉父本，但各卷目錄、行格均整齊一過。又如遇陳本有誤謬難以疏通者，亦逕改，是其底本之字亦有經改動者。其遇異文難以明斷者，則以「一作」注於字下。二馮本注多用「宋本作某」，初以為此宋本應為陳玉父本，然往往與馮抄本不合，經調查，二馮校本言「宋本」者有兩種情況：一、合於趙本，而不合於馮鈔本和孟氏刻本；二、與趙本不合，來源不知。第一種情況如：

卷一〈古詩〉「慄慄歲云暮」句「慄慄」二字下注：「宋本作『廩廩』」。馮抄本作「慄慄」，趙氏覆宋本作「廩廩」。又「夢想見容輝」句「輝」下注：「宋本作『輝』。後倣此。」馮抄本作「輝」，趙本作「輝」。又如「諒無晨風翼」句「晨」下注：「宋本作『鷗』。後倣此。」查馮抄本作「晨」，趙本正作「鷗」。如此之例，說明馮校本所稱「宋本」，往往指趙本。茲再舉數例如下：

卷七梁武帝〈擣衣〉「文成雙鴛鴦」句「成」字，馮校本作「武」，校稱「宋本作『成』」。案，馮抄本作「武」，趙本作「成」，是校語所稱「宋本」合於趙本。

同卷蕭綱〈妾薄命〉「簾鏡迷朝色」句「簾」字：馮校本作「奩」，校說：「宋本作『簾』」。案，馮抄本作「奩」，趙本作「簾」，校語合於趙本。

同卷七蕭繹〈登顏園故閣〉「猶懸北窗櫳」句「櫳」，馮校本作「幌」，校說：「宋本作『櫳』」。案，馮抄本作「幌」，趙本作「櫳」，校語合於趙本。

卷八劉孝威〈都縣遇見人織率爾寄婦〉「鏤玉同心溝」句「溝」字，馮校

本作「藕」，校說：「宋本作『瀉』」。案，馮抄本作「藕」，趙本作「瀉」，校語合於趙本。

卷九釋寶月〈行路難〉「倩人為君除白髮」句「倩」字，馮校本作「情」，校說：「宋本作『倩』」。案，馮抄本作「情」，趙本作「倩」，校語合於趙本。

卷九徐君蒨〈別義陽郡〉「莊成更點星」句「莊成」：馮校本重「莊成」二字，校說：「宋本缺『莊成』二字。」案，馮抄本不缺，趙本缺，校語合於趙本。

卷九沈約〈霜來悲梧桐〉「徙置北堂垂」句「徙」字，馮校本作「從」，校：「宋本作『徙』」。案，馮抄本作「從」，趙本作「徙」，校語合於趙本。

全書此例尚多，據此可知馮鼇刻本所稱「宋本」並非出自陳玉父本，亦非出自馮抄本，而實與趙本相合。但二馮見過陳玉父本，且有抄本在，不應出此誤校，據馮鼇跋語，頗疑此種校語皆出自馮鼇，其時馮鼇既不能見到陳玉父本，亦不能見到馮抄本，僅能據趙均覆宋本為宋本，故有如此校語。

第二種情況有：

卷二魏明帝〈樂府〉「輝光燭我牀」句「燭」字，馮校稱：「宋本作『獨』」。此字趙本作「燭」，馮抄本及孟本均作「燭」，又不知馮校根據何本？

同卷二傅玄〈秋蘭篇〉「香橙雙珠還」句「橙」字，馮校：「宋本作『橙』」。然馮抄本、趙本、孟本均作「橙」。馮抄本原作「橙」字，後塗改為「橙」字，未加「宋本」印，似宋本原當作「橙」字。

卷五〈詠柳〉「因風結復解」句「復」字，馮校：「宋本作『未』」。趙本卻作「復」。

卷六〈與柳惲相贈答〉其五「一為別鶴弄」句「弄」字，馮校本作「棄」，校說：「宋本作『弄』」。案，二馮鈔宋本實作「棄」，馮校本作「棄」，實遵宋本，然卻稱「宋本作『弄』」，顯然據趙本誤校。

這兩種不同情況顯然不是出於同一人所校，故我們懷疑第一種或出於馮鼇之手，第二種據例應為二馮校語，然二馮見過宋玉父本，且有抄本在，似不應出此謬誤，此或為當馮鼇時鈔本已不可見矣。然限於材料，已不可臆測了。

二馮校本除以宋本校外，還有用活本、楊本等參校者，皆出馮鼇之手。卷一〈日出東南隅行〉「鬢鬢頗有鬚」句「鬢鬢」二字下注：「宋本作『髥』」。下又有按語稱：「按，『髥』字字書不載，凡宋刻書『髥』字多如此寫，活本、楊本作『鬢鬢』。《說文》：『力兼切，長貌。』」案，注中「宋本作『髥』」諸字下空一格再加按語，且按語用活本、楊本，故知按語當是馮鼇所加，因馮鼇明稱據楊本、蘭雪堂本參校（此「活本」即蘭雪堂本）。馮鼇既對「宋本作髥鬢」加按語，表明前句當為二馮注，故此知「宋本作某」之注出二馮，用活本、楊本者，皆出馮鼇。又卷七皇太子〈妾薄命〉「傳山猶可逐」句「傳」字，注稱：「楊本作『轉』」。又，「逐」字下注：「〈樂府〉作『還』」。亦為馮鼇所校。

二馮校刻本不僅有校注，亦有考辨。如卷首〈玉臺新詠序〉「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字孝穆撰」下有考訂曰：「《陳書·徐陵傳》云：『太建二年遷尚書左僕射，後主即位，遷太子少傅。』」又引《大唐新語》（略）稱：「檢此，則是書之撰，實在梁朝，可以明證署名如是，明是後人所加也。」案，徐陵署名問題，趙均〈玉臺新詠跋〉說：「虞山馮己倉未見舊本時，常病此書原始梁朝，何緣子山廁入北之詩，孝穆濫擊箋之詠。此本則簡文尚稱皇太子，元帝亦稱湘東王，可以明證。惟武帝之署梁朝，孝穆之列陳銜，並獨不稱名，此一經其子姓書，一為後更定無疑也。得此始盡釋群疑耳。」詳觀趙均此跋，是馮舒先疑明通行本不當收庾信入北之詩以及徐陵在陳所作，及至見到宋本，知《玉臺》原未收庾信和徐陵入北、入陳之詩，又明通行本中所署簡文帝和元帝者，宋本皆書「皇太子」和「湘東王」。至於徐陵列陳朝之銜，則是經其後人所改定。據此，是馮舒最先解徐陵署名之疑，亦與此本考定相符。其他的考訂如卷七〈雍州十曲抄三首〉下有「是襄州」三字，馮校：「此三字應是後人所箋。」又有錄趙本考校者，如卷七〈閨妾寄征人〉，趙本於詩末有注：「目作三首，此首疑衍。」馮校於題下注曰：「宋本目錄作三首，此首疑衍。」其實亦據趙本，但此校疑為馮鼇所為。

《四庫全書存目提要》論馮校之優劣說：「此本即據嘉定本為主，而以諸

本參核之，較諸本為善。如〈序〉中『投壺玉女，為歡盡於百嬌』，據《神異經》及《西京雜記》改為『百驍』，之類皆確有依據，不為竄亂。然如〈蘇武詩〉一首，宋刻本無標題，與《文選》同，舒乃據俗本改為〈留別妻〉；徐幹〈室思詩〉六章，有宋孝武帝擬作，及《藝文類聚》所引可證，乃據俗本改為〈雜詩〉五首、〈室思〉一首；〈塘上行〉，據李善《文選》注，本有四說，宋刻所題，蓋據《歌錄》，第二說乃據《宋書》不確之說改為魏武，移於文帝之前；石崇〈王明君詞·序〉『其造新曲』句，有李善《文選》注、劉履《文選補遺》可證，乃據俗本改為『新造』；楊方〈合歡詩〉五首，有《藝文類聚》及《樂府詩集》可證，乃據《詩紀》改為〈合歡詩〉二首、〈雜詩〉三首；梁簡文帝〈率爾為詠〉，『為』字本讀去聲，乃誤讀平聲，遂據俗本改為『成詠』；王筠〈和吳主簿詩〉『青駸逐黃口』句，有〈西京賦〉可證，乃臆改為『青鶻』，皆未免失考。至於張衡〈同聲歌〉之『恐栗若探湯』句，宋刻誤『栗』為『瞞』，又『思為莞蒨席』句，宋刻誤『莞』為『苑』，蘇伯玉〈盤中詩〉，有《滄浪詩話》可證，宋刻誤連入傅玄詩中、〈漢成帝時童謠〉『燕燕尾涎涎』句有舊本《漢書》可證，宋刻誤為『尾殿殿』，皆訛舛顯然，而曲為回護，又往往失之拘泥。」故《提要》說此本雖勝俗刻，但終不及原本，故以其附於《存目》。然即以《四庫全書存目提要》所論蘇武〈留別妻〉、徐幹〈室思〉、楊方〈合歡〉諸題為例，馮舒《詩紀匡謬》實已辨馮惟訥《古詩紀》之謬，如論〈留別妻〉題曰：「《玉臺》第一卷有此題云：『蘇武詩一首』，並不作〈留別妻〉也。因此一誤，今人更有以梁武〈代蘇屬國婦〉一首為武妻答詩，更可笑。」<sup>12</sup>又如論徐幹〈室思〉說：「按《樂府詩集》云：徐幹〈室思詩〉其第三章曰：『自君之出矣』，宋孝武『自君之出矣，金翠闇無精』詩，《藝文》亦題〈擬室思〉，則此詩之為〈室思〉無疑也。今遽以前五篇為〈雜詩〉，而獨以『人靡不有初』當〈室思〉，誤也。」但不知二馮校本為何仍遵舊題？是亦一疑。

二馮校《玉臺新詠》目的，亦如《四庫全書存目提要·馮定遠集》說：「二

<sup>12</sup> 《知不足齋叢書》本第十九集，清乾隆嘉慶間刻本。下同。

人皆以晚唐為宗，由溫李以上溯齊梁，故《才調集》外又有《玉臺新詠》評本，蓋其淵源在二書也。」<sup>13</sup>

### 三、《四庫全書》本<sup>14</sup>

本文所說《四庫全書》本主要是文淵閣藏本及由商務印書館新影印的文津閣本。據《四庫全書總目》說，此本是紀昀家進獻。《四庫全書總目》說：「此本為趙宦光家所傳宋刻，末有嘉定乙亥永嘉陳玉父重刻跋，最為完善。」似紀昀進獻本即趙均家藏陳玉父本。按，趙均家藏這部陳玉父本，下落頗為撲朔。因為錢謙益亦曾藏過這部《玉臺新詠》。《牧齋有學集》卷第四十六（四部叢刊本）載錢謙益〈跋玉臺新詠〉說：「《玉臺新詠》宋刻本，出自寒山趙氏，本孝穆在梁時所撰。卷中簡文尚稱皇太子，元帝稱湘東王，可以考見今流俗本為俗子矯亂，又妄增詩二百首，賴此本少存孝穆舊觀，良可寶也。凡古書一經庸人手，紕繆百出，便應付蠟車覆瓿，不獨此集也。」可見宋本自趙均手中流入錢謙益絳雲樓。查《天祿琳琅書目》，其著錄宋本《玉臺新詠》共有兩部，一為錢謙益藏，一為明王鏊藏，確證錢謙益藏有宋本《玉臺新詠》。但據《天祿琳琅書目》，這部《玉臺新詠》只有錢謙益和未詳何人的「海翁」及「餘春堂」藏印。<sup>15</sup> 不管如何，這部錢謙益得自趙均家的宋本，似乎未再流傳，就入了內廷，既與紀昀沒有關係，也與別人無關。然錢曾《讀書敏求記》所記並非如此。據錢曾《讀書敏求記》，他也藏過這部出自趙均家的宋本。他在該書卷四比較詳細地交待了這本書的來歷：「是集緣本東朝，事先天監，流俗本妄增

<sup>13</sup> 《四庫全書總目》，卷 181，《集部·別集類存目》八，清同治七年廣東書局刊本。

<sup>14</sup> 詳參拙作：〈《四庫全書》所收《玉臺新詠》底本非宋本考〉，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 年第 2 期，頁 83-91。

<sup>15</sup> 承本文審查者見告，謂此「海翁」或為明人宋登春。查宋登春真定府（河北省正定縣）人，號海翁。然其人一生落拓不偶，窮愁潦倒，似未能持宋本者，此或為《天祿琳琅書目》所稱未詳的原因。本文姑且存疑，然亦深為感謝審查者指教。

詩幾二百首，遂至子山竄入北之篇，孝穆濫擊箋之曲，良可笑也。此本出自趙氏，余得之於黃子羽。卷中簡文尚稱皇太子，元帝稱湘東王，未改選錄舊觀。牧翁云，凡古書一經庸妄之手，紕繆百出，便應付蠟車覆瓿，不獨此集也。披覽之餘，覆視牧翁跋語，爲之掩卷愴然。」明說此書自錢謙益家中流出至黃子羽處，又爲錢曾架上之物。既然如此，《天祿琳琅書目》所著錄的錢謙益所藏宋本與錢曾此本是何關係呢？如果《天祿琳琅書目》著錄本就是錢曾所藏本的話，爲什麼沒有錢曾等人的藏印呢？而且此本與紀昀進獻本又是什麼關係呢？因此，趙均家藏本的下落不能不啓人疑竇。

以上的問題沒有解決，則《四庫》本的來源的確說明不清楚。而說不清楚，則對《四庫》本出現的諸多問題難以作出準確判斷。

我們常用的《四庫》本，主要是文淵閣本。一般認爲文淵閣《四庫全書》是七部《四庫全書》中最具價值的一部，此書纂修始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成書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是第一部完成抄寫的《四庫全書》，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1986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將其影印出版，1999年，迪志公司與上海人民出版社聯合製作電子版，從此文淵閣《四庫全書》得以爲學術界使用。關於這部書的學術價值和另外存世的文津閣本和文溯閣本有什麼不同，可能因爲各種條件的限制，還沒有人作過認真地調查，所以一般仍然信守傳統的說法，以爲文淵閣本最爲優秀。對此，我不敢加以評價，因爲沒有作過全面的比較，但僅就我所研究的《玉臺新詠》一書而言，我發覺文淵閣本實在可以用潦草、糊弄來描述館臣的工作。

那麼，文淵閣《四庫》本有什麼問題呢？

以文淵閣《四庫》本《玉臺新詠》與趙均覆宋本相校，就會發現文淵閣本隨意改動原文，與《四庫總目》說其底本爲趙均家舊藏宋陳玉父本完全不合。

據《四庫全書總目》說，《四庫》本的底本是「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而此本爲趙宦光家所藏宋刻，趙宦光的兒子趙均在崇禎六年覆刻此本，那麼，《四庫》本應該與趙均覆宋本相符。但其實不然，《四庫》本與趙氏覆宋本存有許多歧異。比如就卷一目錄所載徐幹詩看，趙氏本的格式是：徐幹詩二首室

思一首，《四庫》本爲：徐幹詩二首。《四庫》本格式不符趙本。當然，趙均覆宋本對陳玉父本也作過一些改動。馮班〈玉臺新詠校本跋〉說：「己丑歲借得宋刻本校過一次，宋刻訛謬甚多，趙氏所改，得失相半，姑兩存之。不敢妄斷。至於行款參差不一，趙氏已整齊一番矣。」據此，是陳玉父宋本的行款，本參差不齊，趙均覆刻時作過整齊的工作。似乎《四庫》本行款與趙均本不一，不能說明《四庫》本就不合宋本原貌。宋陳玉父本現已失傳，無可參稽，但幸有馮舒、馮班兄弟過錄本存世，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與《四庫》本相校，可見《四庫》本亦不合宋本原貌。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文淵閣本與宋陳玉父本對蕭綱署名的不同。《玉臺新詠》卷七收錄蕭衍父子作品，其中蕭綱在宋本中署爲「皇太子」，而文淵閣本則署「梁簡文帝」。文淵閣本這個署名，完全是抄自明代通行本，而非宋本。趙均〈玉臺新詠跋〉中曾說：「此本則簡文尚稱皇太子，元帝亦稱湘東王。」紀昀主修的《四庫全書總目》亦說：「是書作于梁時，故簡文稱皇太子，元帝稱湘東王。」都可見宋本於蕭綱應該題「皇太子」。文淵閣本這樣的題銜，顯然不是出自宋本。

這樣的隨意改動，可以說遍佈在文淵閣本《玉臺新詠》中。如卷七目錄，文淵閣本爲：「梁武帝詩十四首梁簡文帝詩四十三首邵陵王綸詩三首湘東王繹詩七首武陵王紀詩四首」，趙均覆宋本作：「梁武帝一十四首皇太子聖製四十三首邵陵王綸詩三首湘東王繹詩七首武陵王紀詩三<sup>16</sup>首」。文淵閣本將「皇太子」改作「梁簡文帝」。在正文中也是如此，文淵閣本題作「梁簡文帝」。卷九、卷十的目錄和正文也是如此，涉及到蕭綱的部分，均改爲「梁簡文帝」。又卷九開頭關於〈東飛伯勞〉、〈河中之水〉兩首古辭的題名，文淵閣本亦頗奇怪，於第一首題作「梁武帝歌辭一首」，第二首題作「梁元帝樂府一首」。事實上趙氏覆宋本於此均題「歌辭二首」。對於這兩首歌辭的所有權，《玉臺新詠考異》曾有過考辨說：「此二首，《藝文類聚》亦並作古詞，然核其時代，

<sup>16</sup> 按，「三」當為「四」。

不應在〈越人歌〉之前。按，《文苑英華》載前一首為梁武帝作，《樂府詩集》載後一首亦為梁武帝作，疑此二詩本署武帝，序在簡文之前，後人因《藝文類聚》之文改為古詞，升之卷端，而偶忘《越人歌》等之尤古耳。觀前八卷五言詩及第十卷五言小詩，均以梁武列簡文前，獨此卷歌詞有簡文而無梁武，其為改竄移掇，痕跡顯然可觀也。」根據《考異》的說法，宋本可能原題「梁武帝歌辭二首」，本在卷中的蕭綱之前，後人因《藝文類聚》題古辭，故升在卷首。趙均覆宋本改為「古辭二首」，可能是覺得署梁武帝詩不確，故從《藝文類聚》改為「古辭」。那麼，如果文淵閣本的底本是宋本，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將第二首題「梁元帝樂府」。

此外，就字句看，文淵閣《四庫》本改動也很多，如〈玉臺新詠序〉「加以天時開朗」句的「時」，《四庫》本改為「情」。按，《玉臺新詠考異》此字亦改作「情」，根據是：「『情』，《藝文類聚》、宋刻作『時』，《文苑英華》作『晴』。案，《魏書·崔光傳》曰：『天情沖謙，動定祇愧。』《齊書·王文殊傳》曰：『婚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庾信〈譙國夫人步陸孤氏墓誌〉曰：『敬愛天情，言容禮典。』則『天情』二字，本南北朝之習語，蓋訛『情』為『晴』，又訛『晴』為『時』耳。揆以文意，舛誤顯然，今改正。」《考異》據《魏書》、《齊書》及庾信的作品為證，又有《文苑英華》的版本依據，應該是有道理的，但《考異》可以這樣作，而鈔錄進《四庫》的原本卻是萬萬不可這樣做的。紀昀深諳版本，但不知為何會如此改動原本，以致《四庫全書總目》所說的宋本，名不符實。

經過仔細研索，我們認為紀昀家藏這部號稱宋本《玉臺新詠》，其實是趙均覆宋本，而且是補版後印的印本，在〈《玉臺新詠》趙氏覆宋本的刊印〉一文中，我歸之為第三種類型印本。紀昀所得之本，因趙跋割去而冒充宋本，竟然連紀昀也被騙過。這樣說的理由是，趙均覆宋本第三種類型印本有幾個顯著的特徵，均見於《四庫全書》本。比如趙均覆宋後印本卷四顏延之〈為織女贈牽牛〉詩中有兩句修版誤字：「常娥棲飛月」句「娥」字，誤作「城」、「漢陰不久張」句「漢」字，誤作「隴」。文淵閣本「娥」字不誤，但「漢」字誤

作「隴」。作「隴」字者，這第三種類型後印本獨有的特徵，因為底板「漢」字已經漫漶不清，刻工誤描為「隴」字。至於「娥」字不誤，是因為抄錄者據常識所改。紀昀在《玉臺新詠考異》卷四顏延年〈秋胡詩〉末校說：「案此詩宋刻訛舛特甚，驗其字畫，此一板乃出補刻。今從《文選》所載，凡宋刻異同悉不註。」紀昀所說此詩之版訛舛特甚，故於其異同不再出注。所以「娥」字因為很容易識別，故逕改而不加說明。趙均覆本的這一個後印本，訛謬最多者即顏延之這兩首詩，除了兩處外，還有〈秋胡詩〉中的「行路正威遲」句「路」字誤作「路」、「遲」誤作「退」、「違脫巾」三字誤作「遠晚申」、「見榮枯」「見」誤作「是」、「相與昧」三字誤作「褐與時」。不過，《四庫》館臣均未遵誤字，而逕改正字。這一點，除了紀昀的校語外，還有別的證據可以證明。如卷十〈長樂佳〉「佳」字，後印本誤作「住」，趙均覆宋本的初刻初印本及初刻修板重印本均不誤，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也寫作「佳」，但卻是為館臣所改。這個證據見於《玉臺新詠考異》校語：「佳，宋刻作『住』，誤。」就是說，館臣所據底本原作「住」字，但紀昀以為是誤字，所以逕改。

說紀昀的底本是趙均覆宋本的補板後印本，更有確然的證據，卷末陳玉父跋文有兩處文字：「止乎禮義者蓋以矣」、「自唐《苗閒集》已不足道」，前句中的「以」字，為「鮮」的誤字，後句的「苗」字，為「花」的誤字。這兩處在趙均覆宋本的初刻初印本及修板重印本中均不誤，可見《四庫全書》本底本所用為趙均覆宋本的後印本。有意思的是，這兩個字，《玉臺新詠考異》將「苗」字逕改為「花」字，但校「以」字說：「『以』字於義當作『異』」。這個在後人看來很簡單的字，其實並不簡單，連紀昀也不能判斷此字當作「鮮」，於此亦可知刻工更無可能據漫漶底板能作出正確判斷了。

趙均覆宋本對陳玉父原本作了許多改動，不僅行格款式，文字亦改動不少，其在覆刊以後，因為發現有誤字及覺改動陳玉父本不甚合理若干，故重新修板再印，這個印本，我稱之為修板重印，屬於第二種類型印本。第二種類型印本印出之後的若干年，板片轉移，且泐裂漫漶，如卷四顏延之詩和卷末陳玉父跋，得其板片者遂補板再印，於是產生了更多、但也更有特徵的誤字，我稱

之為補板後印，屬於第三種類型印本。這個後印本的底板就是第二種類型印本的底板，因此第二種類型印本的特徵，第三種類型印本也都保留。關於此點，我在〈《玉臺新詠》趙氏覆宋本的刊印〉一文中詳細描述過，可以參看。這裡且略舉幾例，以見《四庫全書》本的底本確為趙氏覆宋本。

- 一、卷二目錄石崇〈王昭君辭一首〉，初刻初印本無「並序」二字，修版重印本增，補版後印本同，《四庫全書》本有「並序」二字。
- 二、卷五沈約〈擬三婦豔〉詩，初刻初印本有「豔」字，修版重印本據陳玉父刻本刪去，補版後印本同。《四庫全書》本亦無。《玉臺新詠考異》說：「『擬三婦豔』，宋刻無『豔』字，然諸本皆有之，諸家所擬亦皆作『三婦豔』，蓋宋刻誤脫。」紀昀所指宋刻非陳玉父本，而實據趙均覆宋本的后印本。
- 三、卷六目錄孔翁歸〈奉湘東王班姬一首〉「奉」字，初刻初印本作「奉」，修版重印本作「和」，補版後印本同。《四庫全書》本作「和」。
- 四、卷七〈詠晚樓鳥〉「風多前鳥駛」句「鳥駛」二字，初刻初印本、修板重印本均同，補版後印本誤作「歸□」。《四庫全書》本作「歸駛」，是館臣所據底本作「歸□」，但「□」字明顯不成字，故改為「駛」字。案，《玉臺新詠考異》校說：「『歸』，《藝文類聚》、《文苑英華》並作『鳥』」。可見紀昀未見陳玉父宋本，也未見趙均初刻初印及修版重印本，故僅能據《藝文類聚》和《太平御覽》出校。
- 五、卷七〈和湘東王應令夜寢〉，初刻初印本作「應令夜寢」，修板重印本改作「夜寢應令」，補版後印本同。《四庫全書》本亦作「夜寢應令」。案，陳玉父宋本原作「和湘東王夜寢應令」，初刻初印本改作「和湘東王應令夜寢」，修版重印本又據陳本改回。故見《四庫全書》本所據是趙氏覆宋本的后印本。
- 六、卷十江洪〈秋風〉其二，修板重印本及補版後印本有「已上六首和巴陵王四詠」十字，初刻初印本無。《四庫全書》本無此十字，但《玉臺新詠考異》說：「宋刻原註『已上六首和巴陵王四詠。』」是《四庫全書》所據

底本有此十字，但被館臣刪落。案，據二馮鈔陳玉父本，原有此十字，趙均覆宋初刻初印本未刻入，修板重印時重又刻入。《玉臺新詠考異》說宋刻原注有此十字，故見《四庫全書》本所據非陳玉父本，實為趙均覆宋本的后印本。

以上是《四庫全書》本同於趙均覆宋本的例證，除此以外，我們還可以據二馮鈔陳玉父本證明《四庫全書》本決非出自陳玉父本，《四庫全書》本完全看不出陳玉父本的特徵。

以上諸例充分說明紀昀所藏後上進給朝廷者，實為趙均覆宋本，而非陳玉父刻本。並且這個覆宋本還是趙氏印本的補版，亦可見補版後印的時間的確在清初便發生了。這與我們在〈《玉臺新詠》趙氏覆宋本的刊印〉一文中所說的汲古閣藏本便已發生修板相合。汲古閣藏之後為徐乾學藏，時間為明末清初，較紀昀時間要早，因此紀昀所藏為補版後印本，一點也不令人感到意外。此外，由紀昀著錄的失誤，我們亦頗懷疑錢曾《讀書敏求記》著錄的《玉臺新詠》，很可能亦是趙氏覆宋本。

但同是《四庫全書》，文津閣本《玉臺新詠》與文淵閣本又有較多不同。文津閣《四庫》本近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影印行世，查閱此閣《玉臺新詠》，發現它與文淵閣本有很大不同。以上許多文淵閣本改動宋本原字之處，文津閣本卻依然保留宋本原貌。如上舉〈玉臺新詠序〉中「天時開朗」的「時」、「靈飛太甲」的「太」、「因勝西蜀豪家」的「因」，文津閣本均保留宋本原貌。再如上舉文淵閣本對蕭綱題名的改動，文津閣本則均保留了原貌，而與趙氏覆宋本相同。故若僅就《玉臺新詠》一書而言，文津閣《四庫全書》本更具有學術價值，更能保存底本的原貌。<sup>17</sup>

不過，文津閣本也並非全依宋本，亦有改動之處，如〈玉臺新詠序〉中的「橫榴寶樹」的「榴」，改為「抽」字。不同的是，文津閣本於所改動之處，

<sup>17</sup> 文津閣本不同於文淵閣本的文獻價值，可參傅璇琮〈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文獻價值〉一文，原載 2003 年 8 月 13 日《中華讀書報》，此據新華網 2003 年 8 月 15 日報導。

偶會加上校語，如「橫抽寶樹」句下校稱：「宋本作『摺』」。

文津閣本也參據了《考異》，如〈紫蘭始萌〉「二遊何足壞」句「壞」字，文淵閣《四庫》本從宋本作「壞」，《考異》從孟氏本作「懷」，文津閣本也作「懷」，當是參據的《考異》。

還有一些既不同於文淵閣本，也不同於宋本之處，如趙本卷一古樂府〈日出東南隅行〉「來歸相喜怒」句「喜怒」二字，文淵閣本和《考異》均作「怨怒」，而文津閣本則作「嘻怒」。這說明文津閣本也有過不同程度的改動，但大體上還能保留原貌。如卷中涉及蕭綱的題名，除作「皇太子」之外，亦在題下加注：「簡文」二字，與趙本相同，似可說明「簡文」二字並非趙均所加，而是宋本原有的文字。又如卷九〈東飛伯勞〉、〈河中之水〉兩首古辭，文津閣本題作「梁武帝」，很可能也是宋本原貌，趙本題為「古辭」，則可能是趙均所改。這些都顯示了文津閣本的文獻價值，有可補趙本的地方。

按，文津閣本原藏承德避暑山莊，1914年移入北京，後藏於京師圖書館，八十年代移入北京圖書館。據傅璇琮先生〈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文獻價值〉一文說，文淵閣《四庫全書》在乾隆四十六年修成後，又陸續繕寫三部，即文溯閣本（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文源閣本（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文津閣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其中文津閣本是最後繕寫的。傅文還說，《四庫全書》在成書後，曾作過兩次全面覆查，而這兩次覆查的起因都是從文津閣本開始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清高宗在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本貯藏地），於消閑時翻檢此書，發現有訛誤，於是下令全面覆查。五十六年（1791）七月，高宗在避暑山莊又發現已經覆查的文津閣本，揚雄《法言》卷一篇竟有空白二行，大為生氣，又再次下令全面覆查。而這兩次覆查，文津閣本都是由總纂官紀曉嵐（昫）親自帶領有關人員進行的。據此說法，覆查《四庫全書》是因為乾隆帝在避暑山莊讀文津閣本時發現錯誤，才令人重新覆查的。覆查的結果，應該有所修正，但是就我們所知道的《玉臺新詠》一書來看，似乎不在覆查修正之列。因為如果發現《玉臺新詠》有誤的話，北四閣本都應修正統一，而不會出現文淵閣本和文津閣本不一樣的情形。此外，據傅文所說，文淵閣本

最先繕寫完成，後三閣當據文淵閣本繕寫。但文津閣本《玉臺新詠》與文淵閣本如此大的差別，似乎表明文津閣本並非據文淵閣本謄錄，而是根據的原書。

#### 四、吳兆宜箋注本、程琰刪補本

吳兆宜箋注本是至今天學術界還在使用的《玉臺新詠》注本，此本仿李善注例，對詩中語詞出處一一溯其本原，頗便使用。《玉臺新詠箋注》成書後，惜未刊板，其後長洲程琰據以刪補，於乾隆三十九年刊行。但是吳兆宜注本的原貌已經改變，由於與程氏合刊行世，故後人已難以盡窺吳氏真面目。這裡簡單就現在流行的吳兆宜箋注、程琰刪補本作一說明。

我們今天見到的吳、程本，主要是乾隆三十九年刻本，此本載有吳兆宜康熙乙卯年的〈序〉，康熙乙卯，即康熙十四年（1675）。吳兆宜注完成以後，徐鉉為之作序。據徐序，徐鉉稱吳兆宜為內兄，故當是其內弟。據徐序說，趙均覆宋本當時僅印百十餘本，經滄桑之變，書板已毀廢。康熙時，趙均覆宋本流傳亦無幾，吳兆宜得此一本，遂取以作注。據這個說法，吳兆宜所用底本即是趙氏覆宋本。吳兆宜注本當時未能梓刻，至乾隆年間，程琰得吳兆宜注本，嫌其「疵類時有」，又為「鈔胥傳寫，烏焉亥豕，脫誤亦多」，故取而加以刪注，遂成為現在所見的吳、程箋注本。

箋注本載有阮學浚及程琰的跋，阮跋說：「松陵吳顯令氏箋注徐孝穆集，予得舊槧板，重加補剞。復見《玉臺新詠注》本，思欲校勘付梓，而心慵筆倦，日減讎書之課，不果也。程子東冶博學好古，取而訂之，吳注雖引證典核，而胥鈔多脫誤，今則訛者悉正，且刪繁補闕，參以評點，洵為善本。徐箋不及禪代諸制，後為徐大文氏增補。此編得程東冶重訂，兩書皆全璧矣。刻既成，用志數語，深喜東冶之獲我心也。」阮跋作於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冬日，是程琰付梓之前所作。阮跋稱吳兆宜注本，鈔多訛誤，這應是事實，因為不僅阮跋如是說，程跋亦說：「中為鈔胥傳寫，烏焉亥豕，脫誤亦多。」阮、程因要突出自己的成績，難免有不實之辭，而紀昀在其所得吳兆宜原本跋中亦如此說：「鈔

胥潦草，訛不勝乙。」應該是得其實際的。其實，吳兆宜注本的鈔胥潦草，是有原因的，這一點以下再說。

就今日所見之箋注本，已經看不出吳兆宜訛謬在什麼地方，這固然對於讀書人是好事，因為經過程琰的整理，已經糾正了吳氏的訛謬，但對瞭解《玉臺新詠》研究史的學術界來說，則未必是好事。因為吳兆宜的訛謬，到底是怎樣的情形，我們只是聽程琰所說而已。如果確係訛謬，也可以作為《玉臺新詠》研究史的重要材料。事實上，前人的工作往往會存有不足，而這恰為後人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深入的基礎。對吳兆宜的工作，其實也應該這樣看待。

程琰的刪補工作，可見其跋文，他說他對吳兆宜注的刪補工作，主要有：「原注引五經、四子書中語，人所習見者汰之；載入《文選》及《漢書》者，本六臣注、顏注增刪之；評語，間采之齊次風先生；隙見偶及，有所疏通證明，每條加『按』字以別之。板從趙刻，與徐刻校對同異，其各卷後所增詩，宋槧不載，從顯令注增入者也。」據程跋，他刪去吳注的有原注中《五經》、《四子》書中語及人所常見之辭，他所增補的有《文選》六臣注和《漢書》顏注，又間采齊次風先生評語，程氏個人意見則加「按」字以區別。校勘上則以趙本為底本，用明徐學謨刻本校以同異。文中所說的齊次風，即齊召南，乾隆年間著名學者。對程琰的工作如何說評價，因我們現在能夠見到的吳兆宜注已經被程琰刪改，所以很難對比吳、程的優劣。據現存的這部箋注本，確實很難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幸好，我們發現了吳兆宜箋注本原稿的殘卷，為我們討論問題提供了條件。吳兆宜箋注本原稿現存九、十兩殘卷，現藏臺灣「中央」圖書館。此書原為紀昀藏品，有關本書的具體情況，可以參看拙文〈《玉臺新詠》版本補錄〉，<sup>18</sup>茲不贅。通過對吳兆宜這兩卷的調相，我們發現，被程琰刪除的內容，主要是吳兆宜仿李善《文選》注例所作的說明文字。按，吳兆宜箋注《玉臺新詠》的體例，他沒有明說，通過對這兩殘卷的比讀，我們可以看出他的體例主要有：

<sup>18</sup> 拙作：〈《玉臺新詠》版本補錄〉，《文史》2004年第3期。

1. 仿李善注《文選》例，凡前卷已出之注，逕注「某某見卷幾某注」；2. 引書釋詞出處；3. 校異同。但這三種體例，除後兩種外，第一種已經被程琰刪去。我想這應該不是程琰所說的「訛謬」，因為李善這個注例，一直為後人所讚賞，吳兆宜受到李善的影響，應該是值得肯定才是。程琰將這部分內容刪除，可能是因為覺得會影響他補注的體例，但不幸就將吳注原來頗為精華的內容刪除了。

吳兆宜的這個注例是怎樣的情形呢？

我們以吳兆宜箋注本原稿卷九第一首古辭為例，這一首的前兩句「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吳注：

《歲時記》：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潘子真詩話》：《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予初不曉「黃姑」為何等語，因讀杜公瞻所注宗懔撰《歲時記》，乃知「黃姑」即「河鼓」也。亦猶「霜落」之語轉為「索郎」也。

注中的「霜落」，今本作「桑落」。按，「桑落」語出《水經注》卷四：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采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醕之色，清白若滄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佗同。蘭熏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選，最佳酌矣。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也。

是作「桑落」者為確。程琰在此注之下加「案」稱：「諸家引用多云『黃姑阿母』」。程琰所說諸家引用「黃姑阿母」，據《考異》，唐李商隱〈燕詩〉有：「去應逢阿母」句，自注引〈古詞〉「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阿母時相見。」是李商隱所見作「黃姑阿母」。又，宋《紺珠集》卷八「黃姑」條說：「梁武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阿母時相見。曲名東飛伯勞歌。」則是宋人所見《玉臺》或《梁武帝集》作「黃姑阿母」。程琰所補，於理解本詩異文，自有幫助，但他刪除了吳兆宜關於「伯勞」和「織女」的注，是不太合適的。吳注原稿在注末有：「『伯勞』注見卷五江淹；『織女』注見卷五謝惠連詩。」這個注例完全是李善注《文選》例。李善注例有同卷再見和異卷再見，此即異卷再見例。

《文選》卷一〈東都賦〉「光漢京于諸夏」句李善注：「『諸夏』，已見〈西都賦〉。其異篇再見者，並云已見某篇，他皆類此。」吳兆宜正沿用李善注，這正是吳注的一個重要特點，但卻被程琰刪去。就現存吳兆宜箋注兩殘卷看，所有這種注例均被程琰刪除，這影響了後人對吳注價值的整體評價。

紀昀所藏這兩殘卷的學術價值，並不僅在這一處，事實上，它幫助我們解決了今本《玉臺新詠箋注》在使用底本上的困惑。吳兆宜使用的底本，前文已有介紹，說他用的是趙氏覆宋本，其實吳兆宜最先採用的是明代通行本，可能即是徐學謨刻本，其後發現了趙氏覆宋本，又重新改用趙氏本。正是這個原因，才讓人學術界一直認為吳兆宜底本是趙氏覆宋本的觀點產生了懷疑。

提出這個懷疑的是日本學者齋藤希史。齋藤氏認為，吳兆宜所用底本為明通行本，而非趙本。至於《四庫提要》中說吳氏將明本中增多之詩退歸卷末的問題，齋藤認為是程琰所為，非吳氏。<sup>19</sup> 齋藤希史教授的依據是，今行吳兆宜《箋注》本用字多有不合趙氏本，而合於明代通行本處。比如如卷十范靖婦詩之「靖」，趙本作「靜」，箋注本作「靖」，此不從趙本之例。不從趙本之處，在《箋注》中頗多。如卷二〈甄皇后塘上行〉趙本「莫以豪賢故」，《箋注》作「莫以賢豪故」；「莫以魚肉賤」，《箋注》作「莫以魚賤肉」；「棄捐管與蒯」，《箋注》作「棄捐菅與蒯」。就字句異文看，《箋注》的確與趙本有許多不同。那麼吳兆宜在〈跋〉中稱自己用趙本，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同呢？

從《箋注》本的基本面貌看，應該說是合於趙氏覆宋本的。因為《箋注》本中，蕭衍父子作品置於卷七，而明代通行本則是置於卷五的。這是趙氏本與明代通行本最大的區別。此外，《箋注》本對蕭綱、蕭繹分別題作「皇太子」和「湘東王」。在排序上，也是把蕭繹排在他的哥哥蕭綸之後的，這些都與趙氏覆宋本的特徵相合。正是就這個大的特徵而言，我們相信吳兆宜的說法，是以趙氏本為底本的。但是為什麼又會有許多合於明代通行本的地方呢？

<sup>19</sup> 參見氏著：〈玉臺新詠箋注攷〉，《奈良女子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第41號（1997年）。

當我們看到紀昀所藏吳兆宜《箋注》本原稿殘卷時，這個疑問得到了解決。我們舉卷九數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底本用吳、程《箋注》本）：

1. 〈東飛伯勞〉「南窗北牖掛明光」句  
刻本作「掛明」，校：「一作『桂月』」。然吳兆宜原本正文作「桂月」，校說：「一作『掛明』」。
2. 〈河中之水〉「恨不嫁與東家王」句  
刻本作「嫁與」，校：「一作『早嫁』」。吳兆宜本正文原作「早嫁」，校作「嫁與」。
3. 〈烏孫公主歌詩〉「漢武元封中」句  
刻本作「漢武」，校「一有『帝』字」。吳兆宜原本正文作「漢武帝」，校說：「一無『帝』」。
4. 「至國而自治室宮」句  
刻本作「室宮」，校：「一無『室』字」。吳兆宜原本作「至國而自治宮」，校說：「一作『室宮』」。
5. 肉爲食兮酪爲漿  
「肉爲食」前，程琰補校：「一有『以』字」。吳兆宜原本作「以肉爲食兮酪爲漿」，校說：「一無『以』」。
6. 願爲飛黃鵠兮還故鄉  
刻本吳兆宜在「還」下校：「一作『歸』」。案，吳兆宜原本此句作「願爲黃鵠歸故鄉」，在「爲」下校：「一作『飛』」。在「歸」下校：「一作『還』」。

以上諸例，吳兆宜原本均與今傳刻本相反，刻本中的異文全合趙氏覆宋本，而原本則全合明通行本。這個事實說明吳兆宜最初其實是以明通行本為底本，其後則改為趙氏覆宋本。為什麼會這樣呢？我猜想可能就是因為趙均發現宋陳玉父本，當時在士林中引起轟動，二馮即以宋本為底本校刻印行，宋本最合於徐陵原貌，是當時士林的基本看法。但這時吳兆宜已經以明通行本為底本完成了箋注，因此在得到趙氏覆宋本後，遂將底本改為趙本。不過改得並不徹底，所以才留下不少合於明通行本的文字。

此本載有吳兆宜及程琰兩種校記，極具文獻價值，它為我們提供了《玉臺新詠》諸本異文，尤其吳、程二氏所見本今往往不見，愈顯其珍貴。不過，以之與康熙四十六年孟璟據明萬曆張嗣修手抄巾箱本刻本相校，吳、程二氏諸校語與張嗣修校語往往相合。然張嗣修鈔校本據孟璟跋，似未刊刻，而孟氏本刻於康熙四十六年，晚於吳氏注《玉臺新詠》而早於程琰，吳氏似不能參考孟氏本，其或參考過張嗣修手鈔本，則又不得而知，程氏則可見孟氏本。又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萬曆中張嗣修本多所增竄」，似與此張氏手抄巾箱本不符。據孟氏本看，張嗣修此巾箱本體例上與趙氏刻本基本相合，詩歌數量相差無幾，與「多所增竄」之明通行本完全不同，又不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張嗣修本是何本了。

## 五、徐乃昌影刻本

此為民國徐乃昌據趙氏本重雕。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一函二冊。內頁有上虞羅振玉題署「玉臺新詠十卷」，背署「南陵徐乃昌景印吳郡寒山趙均小宛堂本重雕」。

卷首署：「玉臺新詠集並序」。左右雙邊，版心細黑口，書「玉臺新詠卷某」，下書頁碼。半葉十五行，行三十字。卷首有目錄。版式一如寒山趙氏本。

書後附徐乃昌札記，徐氏合明代五雲溪館活字本、蘭雪堂活字本、楊元鑰刻本、孟璟刻本以及《漢書》、《東觀餘論》、《西溪叢語》、《坦齋通編》、《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文選》、《文苑英華》、《樂府詩集》、《古樂府》、《詩紀》、《古詩類苑》、《滄浪詩話》所引《玉臺新詠》者，撰為校記，是繼清初學者馮、吳、程、紀等人後校此書最為用力者。

徐乃昌刻本一仍趙氏本，由於其刊刻精好，牟利之徒往往割去徐跋及校記以充趙本，又由於趙均覆宋本有初印、修版後印等幾種刊本，世人往往見到的是趙均修版後印本，更由於文學古籍刊行社據徐乃昌舊藏之趙氏本的修版後印本影印出版，遂以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作為趙均覆宋本原貌，故對徐乃昌刻

本與此影印本不同之處，均視作徐乃昌校改。殊不知徐乃昌所藏本，並非趙氏本的初印本，而徐乃昌覆刻趙氏本所據實應為趙氏原刻修板印本，<sup>20</sup> 故徐乃昌刻本不同於他所藏的這個後印本的特徵，並不能作為徐乃昌校改的證據。也就是說，徐乃昌刻本完全按照趙氏覆宋本的原刻修板印本覆刻，說明徐乃昌應當還藏有趙氏本的早期印本。比如卷四「常娥」、「漢陰」、「違脫巾」、「行路」、「威遲」、「見榮枯」、「相與昧」等字，趙氏本的修版後印本均誤作「常城」、「隆陰」、「遠晚申」、「行路」、「威遠」、「是榮枯」、「褐與時」，徐乃昌刻本遵趙氏本的原刻修板印本不誤，但被學術界誤認為是徐乃昌對趙氏本的校改，卻不知趙氏本原並不誤，徐乃昌並未對趙氏本作過校改。徐乃昌曾以趙本與孟璟刻本、五雲溪館活字本、蘭雪堂本、楊玄鑰本、紀昀《考異》本以及各類書、總別集相校，作過長篇校記，故其《笱記》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有意思的是，徐乃昌刻本全依趙均覆宋本的原刻修板印本，與徐乃昌所藏原刻補板印本不同，但其《校記》卻偶有誤遵趙本補板印本者。如卷七湘東王〈詠晚棲鳥〉「風多前鳥駛」句「鳥」字，初印本、修板印本均不誤，但補板印本誤為「歸」字。徐乃昌刻本據修板印本重刻，亦作「鳥」字，但其《校記》引文卻作「風多前歸駛」，校語則稱：「五雲溪館本、孟本均作『鳥』」。意思是趙本與五雲溪館本、孟本不同，其實二本與趙本相同均作「鳥」字。再如卷十〈丁督護歌〉「坎軻戎途間」句「戎途」二字，趙本補板印本誤作「我途」，其初印本及修板重印本均不誤，徐乃昌刻本亦作「戎途」，但其《校記》卻稱：「『我途』，孟本作『戎途』」。是其誤遵補板印本出校。又如卷四顏延之〈秋胡詩〉「漢陰不久張」句「漢」字，趙本補板後印本誤作「隆」，徐乃昌《校記》則引作「漢」，是其又遵修板重印本矣。

（責任校對：方韻慈）

<sup>20</sup> 據我對趙氏覆宋本的調查，認為趙氏本共有三種類型印本：一、初刻初印本；二、初刻修字印本；三、補板後印本。徐乃昌所據底本為第二種類型，即原刻修板印本。詳參拙作：〈《玉臺新詠》趙氏覆宋本的刊印〉。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 《玉臺新詠》：趙均覆宋陳玉父本，清·伊秉綬諸人題跋，涵芬樓舊藏，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初刻初印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再造善本」有影印。
- \* 《玉臺新詠》：徐乃昌舊藏趙氏刻本，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補板後印本。
- \* 《玉臺新詠》：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
- \* 《玉臺新詠》：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影印。
- \* 《玉臺新詠》：徐乃昌影刻趙氏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 《玉臺新詠》：馮舒、馮班校、馮鼇刻本，康熙五十三年硯豐齋刻，今藏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續修四庫全書》有影印本。  
《玉臺新詠》：吳兆宜注、程琰刪本，清乾隆三十九年稻香樓刻本，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
- \* 《玉臺新詠》：吳兆宜注稿本，存卷第九、第十兩卷，紀昀舊藏，今藏臺灣中央圖書館。  
清·紀容舒：《玉臺新詠考異》，《畿輔叢書》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

### 二、近人論著

- 傅璇琮：〈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文獻價值〉，《中華讀書報》（2003年8月13日）。
- 傅 剛：〈《玉臺新詠》版本補錄〉，《文史》2004年第3期，頁149-169。
- 傅 剛：〈《四庫全書》所收《玉臺新詠》底本非宋本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年第2期，頁83-91。

- \* 傅 剛：〈《玉臺新詠》趙氏覆宋本的刊印〉，《文獻》2013年第4期，頁38-54。
- \* 劉躍進：《玉臺新詠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7月。
- \* 林 夕：〈明寒山趙氏小宛堂刻《玉臺新詠》版本之謎〉，《讀書》1997年第7期，頁145-148。
- 魏隱儒：《古籍版本鑒定叢談》，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4年。
- （日）齋藤希史：〈玉臺新詠箋注攷〉，《奈良女子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第41號（1997年）。
-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Yu tai xin yong* [New songs from the jade terrac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ed.). (1989).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Liang Dynasty)
- Yu tai xin yong* [New songs from the jade terrac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ed.). (2005).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Liang Dynasty)
- Yu tai xin yong* [New songs from the jade terrace] (Feng Sh., Ed.). (1633).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Jil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Liang Dynasty)
- Yu tai xin yong* [New songs from the jade terrace] (Xu N.-Ch., Coll.). (1922).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Beij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Liang Dynasty)
- Yu tai xin yong* [New songs from the jade terrace] (Xu N.-Ch., Ed.). (1922).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Beij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Liang Dynasty)
- Yu tai xin yong* [New songs from the jade terrace] (Zhao J., Ed.). (1633).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eij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Liang Dynasty)

---

Dynasty)

- Fu, G. (2013). Yu tai xin yong zhao shi fu song ben de kan yin [The printing of Zhao Jun's reprint edition of the *New songs from the jade terrace*]. *Journal of Documents*, (2013-4).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 Lin, X. (1997). Min han shan zhao shi xiao wan tang ke yu tai xin yong ban ben zhi mi [The mystery of Zhao Jun's edition of the *New songs from the jade terrace*]. *Dushu*, (1997-7). Beijing: SDX Joint.
- Liu, Y.-J. (2000). *Yu tai xin yong yan jiu* [A study on the *New songs from the jade terrace*]. Beijing: Zhonghua.

